

塔耳堡站

位置绝佳曾出土文物



邓共盃 (资料图片)



塔耳堡站

发现汉代砖瓦残片 曾为兵家必争之地

塔耳堡火车站南的高阳村西汉时为胶阳侯国，据《莱州府志》载：“高阳城，高密西北三十里，汉置县，成帝封淮阳王孙并为高阳侯。”这里的“淮阳王孙并”应解答为“淮阳宪王之孙并（即一同）封为高阳侯”就可通了，史料里只记载了这么多，高阳侯冢已经夷为平地，此墓也没有挖掘，至于墓内随葬物，不可考。不知在此周围为何有这么多封侯，例如昌邑侯，就是著名的海昏侯，封于昌邑。高阳往南40公里，有顷王，封高密国，相传系西汉刘章之墓。又至胶阳侯国，汉平帝时封国。汉平帝元始元年(公元1年)，封高密顷王刘章子刘凭为胶阳侯。置胶阳侯国，国都在今昌邑市高阳村。公元8年，王莽废胶阳侯国。有冲突的是，这里面不称高阳侯，而是称为胶阳侯，胶阳侯与高阳侯竟同封于高阳？可能有一处是错误的。

《水经》注：“胶水北迳胶阳东，晏谟伏琛并谓之东亭。自亭经路，南通夷安。”又云：“张奴水夷安东南阜下西北，流历胶阳县注入胶水之左，东北为泽水，循百许里谓之夷安潭。”《高阳志》记载：“大业末废。”该城遗址南北长450余米，东西宽300余米，现高阳村坐落其上，在该地发现汉代的砖瓦残片。成帝即刘骘，字太孙，西汉皇帝，汉元帝刘奭(shì)之子。成帝爱读经书，喜欢文辞，宽博谨慎。成帝即位后，沉湎酒色，荒于政事，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和铁官徒起义。同时任由外戚专政，朝廷大政为太后王政君一族把持，埋下了王莽篡汉的祸根。刘骘，即是高阳侯。西汉淮阳宪王刘钦之孙，淮阳王刘玄之子。刘玄去世后，刘骘继承淮阳王位。到王莽篡汉时，王位被废除，其后事迹不详。绥和二年(前7年)成帝去世，终年44岁，庙号统宗，谥号孝成皇帝，葬于延陵。

高阳再往南，即是方戈庄——岳飞之子岳霖的后代在此建立村庄，繁衍生息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但是，一直到1945年12月7日，驻守在塔耳堡站的日军仍有60多人拒不投降。胶东区一个营和昌南县军民一起，激战一个多小时，驻扎火车站的日军被全部歼灭。1946年2月，国民党军队3000余人包围了驻塔耳堡山西村胶东军区的一个连，战士们奋起反击，激战一下午，直到胶东军区增援部队赶到，国民党军方撤退。

以此地为拉锯战的争取点，地处交通要道，有凤凰山为屏，退可守，进可攻，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之一。

车站名或为音译 出土商代青铜器

塔耳堡站位于昌邑，站名也是火车站带来的，因其周边原没有这一村名。有人思量，此名或为德国人的音译名。1902年建成通车的塔耳堡站，有立兴栈、隆兴栈、利增祥煤场等商号。车站东为朱阳，南为高阳，出车站1公里就是凤凰山，山两侧各有山东、山西村。山上原有庙宇，后因战乱被毁。

塔耳堡站正南方是凤凰山，凤凰山北有凤凰屯，正是凤凰头，东北角有黄瑞埠，是凤凰翅膀，车站正骑在凤凰身上，看来，当年建站人员也是精心选址的。塔耳堡站建得非常气派，十字脊、老虎窗，面对铁路东西走向五间房，后面建有附房，窗下植有草坪，草坪上种着冬青。站舍东山窗上有圆形浮雕，巨石横梁造型。站名书于两侧窗中间。

如今，塔耳堡站日德建筑遗存几乎不见，只一处德建房深处车站建筑群中。如今亦需要保护。

塔耳堡站的故事亦多。

1992年，塔耳堡周边的村子出义务工，所谓义务工就是乡镇组织的公益劳动，劳动者无报酬。这天，村民们出义务工，打算在塔耳堡站家属院东侧挖一条排水沟，一行人一字排开，山西村村民孙仁龙只挖了两锹土就挖到一个金属物件，金光闪闪，且器形美丽，上有铭文，谁也不知这是啥东西，见其上有鎏金，知是一件宝贝。火车站徐金明的父亲有一本厚厚的康熙字典，孙仁龙找到徐金明师傅借来，一张图一张图对照着看。真让他找到了，图上画的，正是他挖到的宝贝。这东西原来叫盃(hé)，是商代的铜器。

消息长了翅膀，各路文物贩子纷纷登门，有人出到了20万元。1992年的20万元，大概可以买一辆普通桑塔娜轿车。如今，这件商代出土的青铜器被摆放在昌邑博物馆内，为孙仁龙捐献。

邓共盃证明昌邑南境曾存邓国族裔

这件商代青铜器名为邓共盃。盃是中国古代盛酒器，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。盃的形状较多，一般是圆口，深腹，有盖，前有流，后有鬲(pàn)，下有三足或四足，盖和鬲之间有链连接。青铜盃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(即夏文化)，盛行于商晚期和西周，流行到春秋战国。中国古代青铜器从商代晚期开始，造型敦厚凝重，装饰繁复，图纹威严神秘，西周大致秉承商代旧制而略有变化。随着王权衰落，礼崩乐坏，青铜礼器中逐渐透出一些令人轻松的气息，旧有的神秘、庄重与沉闷渐渐隐去，而新的有创意的造型和纹饰，一步步走向百姓生活。塔耳堡出土的盃，圆口侈沿，鼓腹，无盖，束颈。腹、颈部饰饕餮云雷纹，一侧有鬲。鬲上有桥型钮，位于正中。前有管状流斜置上腹部。颈部饰三组夔凤纹，共六个单元，每组两两相对，

四周有弦纹作框栏，档微内收。三实足，高9厘米。腹部为象首的变形纹饰，高额、丰耳、硕眉、椭圆目，方润口，取仿大象，象鼻卷舒倾垂触地，塑为铜盃的三足，鬲部腹面直书阴文篆字“邓共尊彝”四个字。

“邓共尊彝”是什么意思？在古代，“登”通“邓”，而根据商代铜器铭文释读的一般规则，第一个字往往代表诸侯国名，即邓国；第二个字是墓主人的名字，也就是此处埋葬的是一位叫“共”的人；后面的文字表明陪葬物品的名称，“彝”，酒器，现泛指祭器。因此，铭文所表达的完整意思应该是：邓国一位叫共的逝者所用的酒器。

据统计，以往出土的带铭文的商周邓国青铜器共十四五件，大部分分布于陕西、河南、湖北三省。而邓共盃为什么会在昌邑出土？原来，商周时期，国族迁徙十分频繁。王献唐著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认为，位于今湖北襄阳县北之邓城、位于今山东兖州一带的春秋时期鲁国之邓邑、位于今河南孟县西南的战国时期魏国之邓邑，均因邓国族裔迁居而得名。由此可推知，昌邑出土的这件邓共盃证明，昌邑南境也曾存在着一支邓国族裔，这一下子就将邓国的活动区域扩展到山东半岛。

塔耳堡站名或为音译，地理位置极佳，这里曾出土过商代青铜器邓共盃。这里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，塔耳堡站南边的高阳村西汉时为胶阳侯国，此处多封侯。现高阳村曾发现汉代的砖瓦残片。高阳村再往南，即是方戈庄——岳飞之子岳霖的后代在此建立村庄，繁衍生息。到了近代，塔耳堡站及其周边仍为兵家必争之地。

